

中融人寿代董事长失联 掀开恒大与中融的互投交易

尽管他在恒大正式任职仅有 3 年，但各种线索显示，他之前所供职的中信银行与之后供职的中融人寿和恒大之间均有紧密联系。

在恒大人寿风险处置迎来官宣后不久，该公司上一任董事长失联。

据获悉，恒大人寿原董事长、现在中融人寿代行董事长之职的朱加麟于 9 月 17 日被带走，目前处于失联状态，具体原因尚未得知。根据朱加麟的从业经历来看，业内多推测应与恒大有关。

朱加麟现年 59 岁，此前在中信任职逾 30 年，期间有 13 年曾在中信旗下的中信保诚人寿工作，后于中信银行副行长任上转投恒大，在 2017 年出任恒大金融集团总裁、2018 年出任恒大人寿董事长。虽然没过多久，朱加麟便辞去了董事长一职，但他在辞任之后仍然担任恒大人寿董事；直至 2021 年末才加入另一家保险公司中融人寿，出任公司副董事长，并在今年 7 月后代行董事长之职至今，但一直未见监管部门公开批复其任职资格。

虽然朱加麟在恒大正式任职的时间不算太长，但其加入的时间点，处

于恒大资产快速膨胀的时期。与此同时，各种线索依然显示，无论是在中信还是中融人寿，其所在的公司与恒大之间均有着紧密联系。比如，朱加麟从中信转投恒大前，中信银行便和恒大集团过往甚密，一度为恒大集团最大“金主”；一名中融人寿原高管则指称，朱加麟在任上曾主导了中融人寿与恒大之间超 40 亿元的互投，是该公司风险最高、问题最大、金额最高的一项关联交易。

而恒大人寿本身的问题同样也涉及到投资端的资金流向问题。在经历了严重资不抵债，被监管部门贴身监管并风险处置后，注册资本金 150 亿元的海港人寿开业，依法承接了恒大人寿的资产、负债、业务、网点、人员，全面履行保险合同义务。该公司的 5 名新股东中，地方国企深圳市鹏联投资有限公司占比达到 51%，保险保障基金持股 25%，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重庆市渝新投资有限公司和太平人寿各持 8%。

近日，恒大集团旗下的融资理财平台恒大财富多人被抓。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发布案情通报称，公安机关依法对恒大财富杜某等涉嫌犯罪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I. 从中信转投恒大



朱加麟（ ）现年 59 岁，出生于 1964 年的，毕业于复旦大学，文学学士，高级经济师，“能言善辩”。他 22 岁就加入了中信公司银行部，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中信实业银行，是改革开放后成立的第一家全国性综合性商业银行，2005 年更名为中信银行。

1986 年 8 月至 1997 年 1 月，朱加麟在中信公司银行部及中信实业银行工作，历任办公室职员、副科长等职务。据了解，他曾任中信实业银行行长洪允成的秘书。期间，朱加麟于 1988 年 9 月至 1989 年 9 月在日本野村证券公司工作研修一年。

1997 年 1 月至 1997 年 12 月，朱加麟在日本生命保险公司及日本财产保险公司工作研修，此后于 1997 年 12 月至 1998 年 10 月任中

信集团保险筹备组负责人。1998年10月至2000年5月，任中信实业银行首席清收主管兼资产保全部总经理。

2000年，中国中信集团和英国保诚集团联合发起创建的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下称“中信保诚人寿”）在广州成立，目前总部设在北京，注册资本金23.6亿元。2023年6月底，中信保诚人寿资产达到2334亿元，中信金融控股公司、英国保诚集团各持股50%。中信保诚人寿是朱加麟职业生涯中的重要一站，他在此任职长达13年，曾任董事、副总经理、首席营运官、副首席执行官等。

2013年，时年49岁的朱加麟从保险条线回到银行领域，出任中信银行党委委员。第二年出任该行副行长，并兼任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党委书记、总经理；2016年12月起兼任北京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据知情人士回忆，朱加麟担任副行长时主要分管零售业务，彼时素以对公业务见长的中信银行正提出往零售转型。同年，农行的零售业务总监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李庆萍空降中信集团，并于2014年7月2日出任中信银行行长，2016年7月升任中信银行董事长。孙德顺则于2014年5月出任中信银行常务副行长，2016年7月任中信银行行长。

2017年9月，朱加麟从中信银行副行长的位置上离任，转投恒大集团，任集团副总裁兼恒大金融集团总裁；2018年7月接替彭建军，出任恒大人寿董事长。

值得一提的是，恒大在2017年的十个月内先后引入了1300亿元战略投资者，涉及25家机构，缓解了自2016年以来紧绷的资金链。这些战略投资者多来自于地方国资、恒大的供应商和项目合作方以及金融机构，均与恒大签订了对赌协议，包括净利润的业绩承诺和股权回购承诺。但市场上对这笔战投的资金来源和性质多有质疑，认为多为明股实债的安排。

有市场人士称，朱加麟参与操盘了恒大引战。在2018年3月31日举办的恒大集团2018年度战略合作伙伴高层峰会上，朱加麟以恒大金融集团总裁的身份出席金融专题会议并发表讲话。这样的身份转换在当时并不算稀奇，但近几年已成为备受纪检监察部门关注的银企“旋转门”。

值得注意的是，中信银行曾为恒大集团最大“金主”之一。在恒大集团年报披露的20多家主要往来银行列表中，中信银行一度排名第一。

公开资料显示，2015年3月，中信银行、中信信托与恒大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中信银行、中信信托分别给予恒大集团授信400亿

元、200 亿元，合计 600 亿元。中信银行和中信信托称，将为恒大集团在综合金融、项目合作、综合授信和现金管理方面，提供一揽子、一站式服务。

2017 年年初，中信银行总行与恒大集团进一步深入“总对总”合作，达成了额度总计超千亿元的授信合作意向，包括 400 亿元综合授信、500 亿元地产基金、200 亿元多元化并购基金、900 亿元内保外贷。

2017 年 5 月，恒大集团宣布进行股权融资，与中信银行位于香港的子公司——信银国际成立的基金联合，开发恒大地产位于深圳、重庆、成都等地的十个项目。其中，信银国际旗下基金以委托贷款形式给项目公司借款 108.5 亿元，除此还将投资 108.5 亿元作为项目资本金。信银国际在这一单业务上就给恒大集团输血 200 多亿元。

彼时，信银国际的董事长为时任中信银行行长孙德顺，他从行长任上退后继续担任了一段时间信银国际董事长的职务，直至 2019 年 9 月被查，2020 年 3 月 20 日被开除党籍。据此前报道，孙德顺在任期间，光顾着追求个人的业绩以及兑现一些老板们的利益，罔顾中央政策的落实；中信银行向恒大集团、佳兆业、华夏幸福等房地产集团通过表内外多种渠道大量放款，争当白衣骑士，致使该行的贷款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房地产贷款增速曾达到 40% 多，制造业贷款压降幅度逾 30%。

孙德顺落马前后，中信银行因对房地产业敞口过大而被中央批评，不得不逐渐压降。近几年来，中信银行在压降房地产贷款占比同时，逐渐加大了对制造业的支持：房地产业贷款占比由 2019 年末的 14.78%下降至 2023 年 6 月末的 10.33%；制造业贷款占比由 2019 年末的 13.18%上升至 2023 年 6 月末的 17.4%。

II. 恒大人寿与恒大自融

朱加麟自 2017 年加入恒大之际，恒大及恒大人寿迎来了一波高速增长的时期。不过，仅在担任董事长一年后，朱加麟便称因个人原因，在 2019 年 10 月辞去在恒大和恒大人寿的一切职务。

业内人士表示，朱加麟决定离开的原因是认为恒大风险较大，但他离职后确实又在恒大待了一段时间。2020 年 9 月，一封落款署名许家印的《关于恳请支持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情况报告》的文件截图不胫而走，暴露了恒大危机将近的信号，虽然当时恒大对此一口否认；到了 2021 年中，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正式爆发。

恒大集团从 2015 年开始进入金融领域，包括入股盛京银行、收购恒大人寿，均是为其自融的目的。其中，恒大集团以 39.39 亿元的对价，从两大国资股东重庆地产集团和重庆城市建设投资公司手中，竞得中

新大东方人寿保险公司（恒大人寿前身）50%的股权。而另外两家各持 25%的股东中，大东方人寿的外方股东严重缺位，重庆财信企业集团则将所持股权质押给了恒大集团，恒大在恒大人寿拥有 100%的话语权。

恒大宣示了发展保险业务的信心和野心。根据公告，恒大计划在 2018 年底使恒大人寿的资产规模达到千亿元以上，是当下资产规模的 26 倍。

同样是从 2015 年起，保险业开始出现多家寿险公司依靠在负债端做大万能险等中短期产品的方式快速筹集资金，在投资端于资本市场掀起了举牌大战，其中也包括恒大人寿，其举牌对象包括国民技术、栋梁新材、中元股份等上市公司。原保监会曾就此派驻检查组，并在 2017 年一季度开出限制股票投资一年的罚单，恒大人寿业不得不开始整改万能险业务。

不过，当时影子银行还在顶峰未受到规制，并未影响到恒大人寿保费和资产规模的膨胀。在朱加麟任职的 2017 年到 2019 年，恒大人寿的保险业务收入分别为 281.01 亿元、323.72 亿元、420.23 亿元；资产规模在 2017 年就提前突破了前述提到的千亿元计划，达到 1038.43 亿元；2018、2019 年分别为 1202.32 亿元、1885.50 亿元。至 2020 年末最后一次披露，恒大人寿的总资产达 2415.42 亿元。

尽管从 2016 年至今，恒大人寿披露的资金运用关联交易项目仅 12 项，合计金额约 135 亿元，但市场普遍认为，恒大人寿与恒大集团产生的资金关联规模远不止于此。

据知情人士透露，恒大人寿的问题主要出在投资端，涉及地产业务，“窟窿”达数百亿元。其中，恒大人寿通过光大永明旗下的合源资本，向恒大输送了至少百亿元的资金。

另有市场人士称，恒大人寿与其他“地产系”寿险公司通过“互投”，来规避监管对于关联交易的规定。部分保险公司会通过信托通道嵌套、与其他非关联的第三方互投资产等手段，以规避监管对于险资集中度和关联度的要求。恒大人寿的挪用手法之一，正是通过投资底层资产包装成应收账款的信托计划，造成应收账款的进度假象，实际上资金则流入关联公司。而仅在恒大人寿担任了一年董事长的朱加麟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III. 中融人寿与恒大的“互投”

在离开恒大人寿后，朱加麟加入了“中天系”的寿险公司，即贵州房地产开发商罗玉平麾下的中融人寿，但其公开的职务信息与恒大人寿出现交叉重叠，在资金运用上也与恒大存在关联。

据中融人寿官网和偿付能力报告，朱加麟自 2020 年 3 月起担任中融人寿董事，于 2022 年 2 月起担任该公司副董事长。不过，这一职务直至今日未见监管部门的批复。

反而是在同一时期，深圳银保监局在 2020 年 3 月批复了朱加麟担任恒大人寿的董事资格；直到 2021 年 10 月恒大人寿召开股东大会临时会议，才表决通过朱加麟不再担任董事的议案。

据了解，朱加麟在 2020 年 3 月后并未完全离开恒大，是因担心在中融人寿的任职资格不能获批，所以一直挂在恒大。直到 2021 年 4 月，据称监管部门内部核准了朱加麟在中融人寿的任职资格，他才于 2021 年 10 月正式离开恒大。据称当时他也曾运作想回到中信银行，但未果。

中融人寿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天金融，其实控人罗玉平在巅峰时期曾有贵州省首富“罗半城”的称号。中融人寿虽然规模不算大，但在公司治理和资金运用方面一直问题不少，大量资金被股东方占用。

截至 2020 年末，中融人寿的总资产为 514 亿元，只有同时期恒大人寿的四分之一。两家公司均在 2021 年三季度后停止对外披露偿付能力报告，这通常意味着保险公司已出现重大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银保监局在 2023 年 6 月 19 日下发了对中融人寿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中融人寿时任董事长余庆飞等人存在套取费用、提供虚假会议材料等问题，并对重大关联交易规避关联交易管理、同渤海人寿与合众人寿以互投形式逃避关联交易审查等交易负有责任。

但余庆飞对此予以否认，并向西城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起诉状。申辩意见书显示，余庆飞指认中融人寿的资金运用一直由公司实控人罗玉平掌握，称“股东单位的人员为主办，其他市场化职业经理人主要是居于中后台做业务营运辅助”。

在前述申辩意见书中，余庆飞同时表示，在监管部门认定的几笔关联交易中，恰恰忽略了风险最高、问题最大、金额最高的一项，即中融人寿与恒大集团累计投资成本总额为 41.29 亿元的互投。而这笔交易，正是由朱加麟与罗玉平主导，二人应对此承担直接责任和主要责任。而朱加麟不仅在没有书面批复核准的情况下就担任了中融人寿的董事，并在外力推动下担任了公司副董事长，主持董事会日常工作，破坏了正常的公司治理秩序。

“2022 年初以来，我在第四届董事会多次会议上对 2022 年公司的全面经营预算计划提出了严重质疑，并指出在控股股东多次公告债务

违约及恒大集团存在债务置换阻碍，公司现有的与控股股东进行债务置换等方案不具有可行性，并存在各种风险和合规隐患，公司对风险化解处置毫不重视和关注等问题。对这些存在问题的风险处置议案，董事会上我投出了反对票；对于我多次提出的法治化、市场化的 50 亿元不良资产包风险化解处置方案，均未被公司理睬。”余庆飞在这份申辩意见书里自述。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末，中融人寿的偿付能力从 2021 年的 77% 下降至-29.99%，净利润从 2021 年的-9.11 亿元下降至-21.64 亿元，净资产从 24.93 亿元下降为-3.91 亿元。目前，中融人寿的风险处置还未见端倪。据报道，中天金融曾希望打包整体出售，一度要价 160 亿元，一个壳加一券商牌照和中融保险，但似乎无人问津。